



《大金普照禅寺泐公长老 灵塔》及金代大同佛教

李树云

大同市博物馆现藏有《大金普照禅寺泐公长老灵塔》幢，该幢石灰岩质，八棱，为金大定间遗物，刻一千二百余言，行文流畅，书法俊美。全文如下：

【塔铭】《大金朔州普照禅寺第五代、故泐公长老灵塔》：通隐居士高潜撰并书。师讳慧泐，俗姓吴氏，涿州范阳人也。幼而奇秀，不茹荤辛，出尘之姿，盖亦天赋。七岁，俾读书，聪慧异于常儿。年十二，启其亲，志求出家。父母既许，遂依崇教寺行直为师。侍奉之余，听习《华严大经》为业，默通其义，直深器美之。而于皇统壬戌岁遇恩，始具戒，时年二十二矣。忽一日，究寻之次，叹曰：“永嘉所谓分名别相，如算海沙，区区曷益？”适闻海慧、清慧二大士提祖佛印，自南方来，振扬玄风于燕台之上，乃辞直师，径造会中。顶谒一见，师资冥契，投诚问道，积有晦朔。一日，诣其室，清慧师竖起拂子，云：“汝拟议，则丧身失命。”师于是豁然开悟，如桶底子脱。与之问答，如珠走盘，了无凝滞。遂密以宗印付师，复付一颂，有针芥相投一句亲之语。已

而,二老师特奉「诏住持会宁长庆禅寺,师亦参随诣彼。其清慧老人命师为侍首,朝夕谘」参,温研不懈,尽得云门之宗旨也。久之,师欲遍谒诸方,以契同异,乃礼辞清慧老师。而老师仍以颂送行,末章有云:“待看他日起风雷,南山吐云北山雨。”师乃腰包西迈,凡见尊宿,锋机险绝,世所稔闻。后届云中,参佛日显老。未几,命师为书记。室中相见,重蒙印可。遂令分座秉拂为众,欲嗣续曹洞之宗风。师默自念,始于佛觉晦堂处有所得,安敢负于初心哉!竟不受。乃拂衣至朔州南禅。盘桓少时,复飞锡之长安,历名山大川、灵境胜迹,无不瞻礼。又东南抵灵岩道场,乃憩锡焉。未逾旬,众请师为座元。是时,今上龙潜,知济南。晦堂专介驰书,嘱之曰:“知灵树果熟自香,愧不忘灵山」付嘱,乃古今一时之遇也。”上以法属之故,忘位[白+八]之,崇以尺书府帖,遣使命师就府,署出世。上躬度疏及法衣一顶,师接授讫,遂升座开法。潮音一震,四众欣然。迎归「普照禅寺,匡弘唱道。俄经数载,倦于应接,因退院事,凉五峰,礼吉祥已,于范仙山度夏。在烦暑不到处作佛祖向上人,而益可敬焉。其平城僧尼士庶素钦师之道风,同白州官丐疏文往彼勸「请,辞不获免,复来南禅,一居二十余年。其道容清深,家风壁立,门如死灰,来者不拒,去亦不留。或「游戏文墨,则词源雄壮;接物为人,则机辩峭捷,罕有投其机者。至于寺之东西廊庑、三门、钟阁并寺额等,皆师一新修备。以缘力故,不劳而成。呜呼,生灭之数,自古而然。于大定己亥仲冬二十四日示有微疾,俨然坐亡。[骨+見]闻之人,岂胜悲悼。师世寿五十有九,僧夏三十有七。荼毗已,收灵骨,建新坟于城西以瘞之,树石塔为表焉。其圣安「堂无为道人,与余友旧也,遣师之门人昭秀状师行事,请文于余,义不可辞,加以余素尝参观师之座右,熟知所为大略。

固如是,敢不书之,以昭方来,辄稽首勉为之。铭曰:

伟哉普照老古锥,师子威雄象王仪;坤维高步更有谁?尝瞻妙相清且奇;霜莲亭亭出淤泥,晦堂法窟真白眉;定力道眼绝瑕疵,香销一炷忘所思;宴坐静宇疏簾垂,少林家风唯自知;肯将黄叶诳小儿,二十年居天一涯;坐阅四海争奔驰,忽然隻履去不疑;寄言门人莫谩悲,明月自满千家「;我今唐突作赞词,装点太虚徒尔为!

大定二十年岁次庚子七月望日,监寺僧祖宁建。在州张公政刊。

朔州普照寺、南禅寺现已不存,具体位置无考。从铭文中可知,浹公长老,涿州范阳人,幼时在崇教寺随行直禅师出家,皇统二年(公元1142年)二十二岁时受具足戒,之后前往燕京求见著名禅师海慧、清慧,得清慧密以宗印相付,又随两位大师北上会宁储庆禅寺研习禅法。尽得云门宗旨之后,浹公长老遍谒诸方,以契同异。他西去长安礼灵境胜地,又东达济南灵岩寺,而且在灵岩寺得到尚在潜邸的金世宗的召请,归朔州普照禅寺匡弘唱道,后在朔州南禅寺居住了二十年,并对南禅寺的东西廊庑、三门、钟阁、寺额进行了维修,大定十九年圆寂。

碑铭中提及的海慧、清慧均为金国著名禅师,《大明高僧传》载,释海慧,金国人,幼而英敏,尝“潜五台刀耕火种就严缚屋”十五年之久,后下五台入燕京,声播寰宇,道布宸宫。皇统三年“英悼太子生。诏海慧大师。于上京宫侧创造大储庆寺”。铭文中“皇统壬戌岁……海慧、清慧二大士提祖佛印,自南方来,振扬玄风于燕台之上……已而二老师特奉诏住持会宁长庆禅寺”,从时间上看当指皇统二年海慧入燕京振扬玄风,皇统三年住持储庆寺一事,长庆禅寺似为储庆禅寺之笔误。“金熙宗……优礼名僧

海慧”，“皇统五年海慧入寂，金主偕后太子亲王百官设供五日。奉分五处建塔。谥曰佛觉祐国大师。”（皇统六年 1146 年）正月，清慧禅师奉诏继任储庆寺住持，赐号佛智护国大师，登国师座。“特赐金襴大衣及所用珍异。其钦敬，古所未有”。

值得注意的是，铭文中提到泂公长老“后届云中，参佛日显老。未几，命师为书记。室中相见，重蒙印可。遂令分座秉拂为众，欲嗣续曹洞之宗风。”但泂公长老是云门中人，“安敢负于初心”，于是拂衣而至朔州南禅寺。禅宗自唐代形成宗派，并分为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五家。至宋代，唯有临济、曹洞、云门兴盛，创派于北方的临济宗特别活跃在南方，而由于金国的边界不断向南扩展以及临济宗势力的南移，源自南方的曹洞宗则在北方站住了脚，从泂公长老到云中参见曹洞宗高僧佛日显老来看，曹洞宗已远播至云中，也就是现在的大同了。

佛教东汉传入我国，南北朝时盛行于大江南北。大同佛教始兴于北魏，并在作为北魏都城近百年之间得到空前发展。“宣武之世专上释氏，普修梵宇。云中号为平城，乃其旧都，故所建为独多”，史载当时平城内的寺院有近百所之多，雕凿雄伟的云冈石窟便是北魏大同佛教繁荣的集中体现。辽代崇佛，作为辽西京的大同，佛教再一次昌盛，保存至今的辽代佛教建筑有兼具皇家祖庙性质的大华严寺、观音堂、善化寺、应县木塔、觉山寺塔等，云冈石窟在辽代也进行了大规模的窟前营建。保大年间，战火绵延，大同寺院遭到严重破坏。但金天辅六年（辽保大二年，1122 年），金平定西京，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基础的大同佛教很快得到恢复，并进一步发展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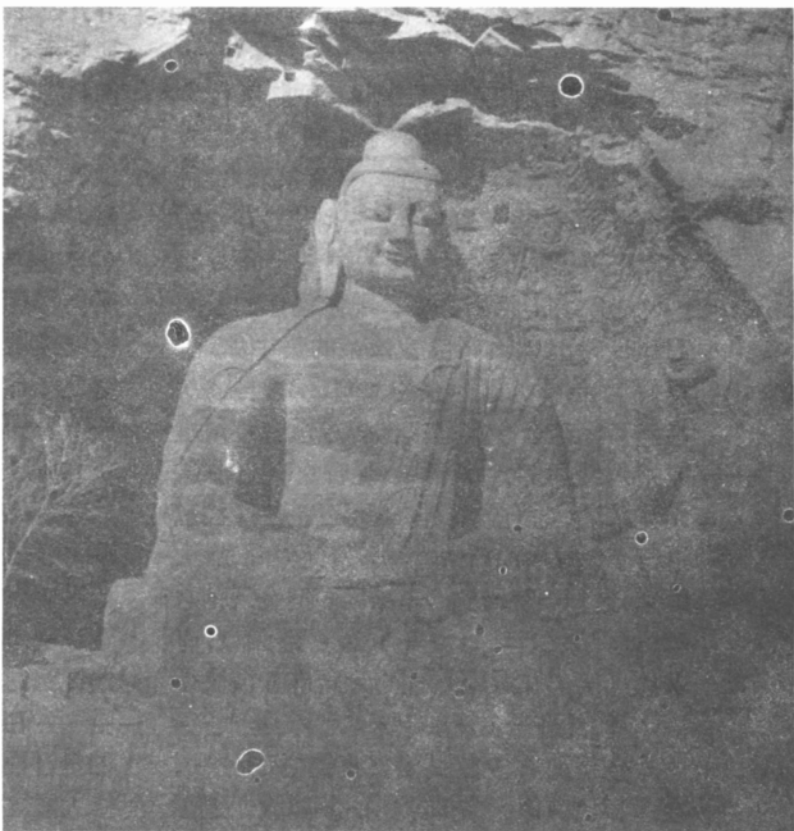
金是北方少数民族女真建立的政权，在建国之前他们信仰原始的萨满教，建国

之后佛教才逐渐传入。随着女真人势力的不断向西南扩展，广泛接触笃信佛教的契丹人、渤海人，以及受汉文化影响的日渐强烈，佛教逐渐传入女真内地。但从天会元年“上京庆元寺僧献佛骨，却之”来看，当时女真皇帝对佛教还是排斥的。金国内地的佛教尚处于起步阶段时，有着广泛信徒的大同地区的佛教却在战乱之后蓬勃再兴。天会二年（1124 年），也就是金攻陷西京两年之后，“故元帅、晋国王到寺（云冈石窟寺）随喜赞叹，晓谕军兵，不令侵扰；并戒纲首，长切守护。又奏，特赐提点僧禅紫衣，并‘通慧大德’号。九年，元帅府以河流近寺，恐致侵啮，委烟火司差夫三千人，改拨河道。”（文见《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以下简称曹衍《金碑》）。随后不久女真人便拉开了在大同恢复昔日梵刹的序幕。天会八年（1130 年）自古号为大兰若的西京大普恩寺开始维修。这座规模宏大的寺院经辽末战争重创，“楼阁飞为埃垞，堂殿聚为瓦砾。前日栋宇所仅存者，十不三四”（文见《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以下简称朱弁碑）。住持圆满大师发勇猛心，募资进行重修。“于斯时也，人以须达自期，家用给孤相勉，咸蕴至愿，争舍所爱。彼髓脑支体尚无所吝，况百骸外物哉！于是辇币委珠金，脱袍鬻裘裳者，相系于道。”（朱弁碑）从捐资盛况和碑阴仅具名高僧大德尊宿沙门就有一百一十余人可知，当时西京大同僧侣众多，佛教影响深远。皇统三年（1143 年）落成后的普恩寺“凡为大殿暨东西朵殿，罗汉洞，文殊、普贤阁，及前殿、大门、左右斜廊，合八十余楹”（朱弁碑），为西京巨刹，这些建筑基本保存下来，至今它仍是大同最大的辽金建筑群。出使金国被扣留的大宋使臣朱弁在普恩寺居住十四年，亲历了维修的全过程，并写下著名的《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之记》。天眷三年（1140 年）华严寺维

修，该寺院在金攻打西京之役中被毁，“伏遇本朝大开正统，天兵一鼓，都城四陷，殿阁楼观，俄而灰之。”（文见《大金国西京大华严寺重修薄伽藏教记》，以下简称段子卿碑）只有斋堂、厨库、宝塔、《经藏》，泊守司徒大师影堂等五座建筑幸存。僧录通悟大师慈济，广达大师通利，大德通义大师辩慧，大德妙行大师泊首座义普，二座德祚等“先出己之净财”，然后“化同居之清众”，加之“外内信心之流”给以援助，耗资“十十余万”，“乃仍其旧址，而特建九间、七间之殿，又构成慈氏、观音、降魔之阁，及会经、钟楼、三门、垛殿。不设期日，巍乎有成。”后僧人省学“聚徒兴役，刈楚剪茨，基之有缺者完其缺，地之不平者治以平，四植花木，中置栏槛，其费五百余万焉。”维修后的华严寺虽不及辽时的规模，却也焕然一新，如同重建。金代巨构——九间之殿大雄宝殿面阔 53.75 米，进深 29 米，是现存全国最大的单体建筑之一。皇统三年（1143 年），因“亡辽季世，盗贼群起，寺遭焚劫，灵岩栋宇，扫地无遗”（曹衍《金碑》）云冈石窟开始维修。“富者乐施其财，贫者愿输其力，于是重修灵岩大阁九楹，门楼四所，香厨、客次之纲常住寺位，凡三十楹，轮奐一新。又创石垣五百余步，屋之以瓦二百余楹。”山门气象，翕然复完，耗资二千万，皇统六年 1146 年落成。（曹衍《金碑》）。

金天会至皇统间，西京大同府遭战争破坏的寺院悉数恢复。“女真人真正接受佛教是从熙宗时期开始的，熙宗本人已成为虔诚的佛教徒，在皇帝的倡导下，金国佛教大盛”。大同寺院的重修多在熙宗朝完成，也有有力地证

明了这一点，而且皇统年间大同的佛教十分隆盛，规模宏大的普恩寺、华严寺雄居大同府内，比邻相望，僧侣信徒往来穿梭，禅语佛音随处可见。从金熙宗开始，“全国从上到下设置一套佛教组织，正式赐予各级佛教领袖以不同的僧官号，京师的最高宗教领袖称国师，帅府设僧录或僧正，州郡设都纲，县设维那，根据他们的资历和学问不同，分别赐予大师、大德等法号”。从大同现存金碑可以看出，《朱弁碑》碑记载皇统年间重建普恩寺的紫褐师德有 10 名之多，其中包括管内都僧录 3 名，另有立石沙门 53 名，比丘 40 名，《段子卿碑》记载具有大师、大德法号的高僧达 25 人，长老 4 名，比丘 21 名，薄伽邑众 800 余名，加之云冈石窟寺及其它寺院更多未见记载的僧侣，应该是个较为庞大的数目。金“大同府，……户九万八千四百四十四”，那么无论是寺院数量



还是僧侣数量所占比例已相当大了。可见当时大同佛教信徒广泛,僧侣众多而且高僧云集,是北方佛教重地。

金世宗号称小尧舜,他除旧布新,拨乱反正,停止了多年的对宋战争,大定期间可谓金的太平盛世,宽松和平的社会环境为佛教的发展创造了更为良好的条件,全国佛教更加兴盛,大同亦然。大同现存佛教碑铭以大定间遗物居多,从中我们可以得知其间大量的佛教活动信息。大定二年《段子卿碑》刊刻,碑中不仅叙述了辽金之际华严寺的兴衰,而且详尽记录了金代大同佛教中一件十分重要的事,那就是大定初年重修“薄伽藏教”。从碑文中得知,华严寺的薄伽教藏殿在辽代原藏有《契丹藏》,保大战乱之后,所藏教本遗失过半,错杂不完。寺僧组建了阵容庞大的薄伽邑对藏经进行重新修定,从“其卷轴式样,新旧不殊,字号论题,后先如一”来看,这是一次以《契丹藏》为蓝本的察漏补缺,从“遍历乎州城、郡邑、乡村、岩谷之间,验其厥目,从而采之。或成帙者,或成卷者;有听赎者,有奉施者。朝寻暮阅,岁历三周”可知,对散佚部分的补全主要来源于民间,可见民间藏经内容宽泛,数量巨大,它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当时佛教信徒遍布于各个角落。“圆兹教典”,不仅是佛家之美事,而且对于当时佛教典籍的流传具有深远意义。大定十六年《朱弁碑》刻成,写于皇统三年的《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之记》,距镌刻成碑已三十三年过去了。以上两碑是目前研究大同辽金佛教、建筑、雕塑最重要的文字资料。其它碑铭有正隆四年(1159年)《观音院故敬公塔记》、大定七年(1167年)《善护大师塔铭并序》、大定十七年(1177)《普恩寺释迦院章师墓铭并序》和《普恩寺高僧院英师幢铭并序》、大定二十年(1180年)《慧明真济大师塔铭》、大定二十一年(1181)《大金国西

京奉恩院首座沙门皓英、道信普通塔记》等。从这些实物资料得知,大定年间大同除华严寺、普恩寺、云冈石窟寺外,尚有西京报恩院、西京奉恩院、观音院、清凉院、兴严寺、永宁寺、宝林寺、大圣寿寺、弘法院等,可谓兰若相望,盛况空前。

金代晚期,虽然国势日衰,佛教却依旧兴盛,特别是女真贵族信佛的人越来越多。刻成于明昌元年的《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释迦如来成道碑铭》,便是由金世宗长子汉王永中立石、永中长子石古乃书写的,著名书法家党怀英为此碑篆额,这标志着金代晚期大同佛教的继续繁荣。

金代佛教兴盛,是和女真人为了缓和各民族间的矛盾而采取的兼收并蓄的政治策略离不开的,金提倡以儒治国,以佛攻心。西京大同地理位置十分独特,是女真人向南攻略的大后方。西京又处于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交汇区,所以对西京统治的稳固显得尤为重要。出于政治上的需求,从女真人进入大同开始,为了争取信仰佛教的汉人、契丹人的拥护和支持,便大力发展佛教,这也是金代大同佛教繁荣昌盛的原因所在。

金代佛教研究资料较少。《大金普照禅寺泐公长老灵塔》提到了多处寺院,如崇教寺、济南灵岩寺等。朔州普照寺,南禅寺现已不存且史料无载,它为山西金代佛教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文中提到的云门宗、曹洞宗对于了解以禅宗为主流的金代大同乃至北方佛教具有重大意义。而金代大同的佛教是中国佛教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研究金代政治、文化、宗教、艺术均有参考价值。